



欧洲思想史译丛

复旦大学世界史译丛



主编 李宏图



历史语境中的市场

——现代世界的思想与政治

Markets in Historical Contexts:
Ideas and Politics in the Modern World

〔英〕马克·贝维尔 〔美〕弗兰克·特伦特曼 编
(Mark Bevir) (Frank Trentman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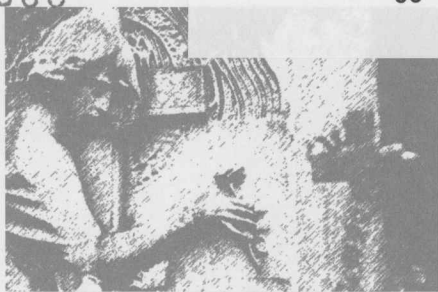
杨芳 卢少鹏 译



人民出版社

014032669

F113-53
05



历史语境中的市场

——现代世界的思想与政治

*Markets in Historical Contexts:
Ideas and Politics in the Modern World*

〔英〕马克·贝维尔 〔美〕弗兰克·特伦特曼 编
(Mark Bevir) (Frank Trentmann)

杨芳 卢少鹏 译



人民出版社



北航

C1720999

F113-53
05

责任编辑:卓 然

责任校对:吕 飞 史 伟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9-387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语境中的市场:现代世界的思想与政治/(英)贝维尔,(美)特伦特曼编;

杨芳,卢少鹏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

(欧洲思想史译丛/李宏图主编)

ISBN 978-7-01-012754-5

I. ①历… II. ①贝… ②特… ③杨… ④卢… III. ①市场经济-经济发展-世界-文集 IV. ①F1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0059 号

Markets in Historical Contexts: Ideas and Politics in the Modern World, edited by Mark Bevir and Frank Trentmann

Copyri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UK

历史语境中的市场

LISHI YUJING ZHONG DE SHICHANG

——现代世界的思想与政治

[英]马克·贝维尔 [美]弗兰克·特伦特曼 编 杨芳 卢少鹏 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7

字数:27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2754-5 定价:4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译丛总序

近十年来，随着中国的社会转型和迈入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整个社会迸发出对阅读西方思想史论著的热情，希冀在思想观念层面为未来的发展找到定位并形成一种建构性的力量。由此也带动了西方思想史研究的迅速升温，有如法国历史学家夏蒂埃形容文化史研究曾经有过的地位：“从地窖到阁楼”，而对于西方思想史研究而言，则是从边缘到中心的转换。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对西方思想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介绍：如剑桥学派、概念史、新文化史，还是对思想史或者观念史的所谓的论辩，以及对思想家和其思想内容的研究无不反映着思想史研究渐入佳境。特别是2012年中央高层领导对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推荐，不仅引发了各种解读，也带来了托克维尔研究和思想史研究的热潮。

正是这持续十来年的西方思想史研究热潮，推动了国内西方思想史研究的前行，也促使我们不断地思考：为什么今日的学界要执着地研究看起来已经久远的西方思想？从接受史的角度来看，社会民众为什么开始如此关注遥远的西方思想？而作为西方思想史研究者，我们必须在这一热潮中保持一分清醒，探究西方思想史研究的真义之所在，而不是为了一时的需要而进行随意的图解，甚至非历史的比附。

由此，也就需要回答：西方思想史研究究竟意义何在？历史研究能否为当下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直接的答案？对此，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研究思想史是为了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找寻延续至今的对政治和社会的理解，以便解决我们今日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或者困境。例如历史学家伍德就认为，人们在过去对解决社会问题所给出的答案和思考也许有助于当代社会的人们。而剑桥学派的代表昆廷·斯金纳则认为，上述回答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它包含着两方面内容，一是认为在思想史的发展中始终存在着一以贯之

的永恒问题；二是将历史当成直接解决我们自身当下问题的重要资源，具有其现实主义的功用。他以研究霍布斯的思想为例写道：企图理解霍布斯的理智世界，是一种非常有趣的事，但如果希冀把他的文本当作一面镜子映照我们自身当前拥有的各种假定和偏见，则很难让人产生真正的兴趣。一个很简单的理由是：霍布斯的世界是如此丰富和奇异，如果我们仅仅是为了寻求解决我们自己现实问题的答案而转向他的世界，不用说，我们将会使我们自己的理智生活走向枯竭。一个更进一步的理由是：如果我们允许自己以一种不太强烈的“关联”感来对待过去，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的研究越展开，越会获得某种历史的视野，这将会帮助我们抵御当前的某些假定和思想习惯，并促发我们对它们进行重新思考。对过去的研究，当它揭示出与当前的种种对比甚至差异，而不只是说明与当前的种种延续性时，并非一定只有较小的启发意义。这就意味着，研究过去的思想家如何对待政治和社会的概念能够使我们审视目前那些仿佛非常棘手的思想观念和社会问题。试图从思想史中直接找到解决我们眼下问题的途径，不仅是一种方法论谬误，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道德错误。而从过去了解什么是必然的，什么是我们自己具体安排的随机性后果，则是获得自知之明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一观点将会给我们一个警醒，研究者不能仅仅从思想史的研究中找到一些结论提供给社会民众，而是要更为深入地思考：在历史的实践中各方力量如何参与其中，他们又是在什么思想观念的引领下进行着这些实践，为什么有些实践成功了，甚至变成了一种体制化的安排，而有些失败，以致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思想史的复杂就在于，尽管作为一种社会实体性内容已经不再存在，但其思想观念也许从未消失，不时会在历史的进程中表现出来。同样，思想史更为迷人之处在于，即使一些思想观念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其本身也是吸收融合了其他思想观念之后形成的，有如18世纪的启蒙和反启蒙，或者在“他者”的对立中而被定义，如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研究思想史的功用自然体现在：通过对不同思想观念之演进的梳理，不仅有助于在长时段中理解思想观念的历史性变化，而且有助于人们反思今天我们接受某种主导性观念的独断性和必然性，因为，从历史上来看，这样的主导性地位是多种力量的产物，是一种博弈的结果。因此，思想史就给了我们一种反思性的力量和学术资源，有助于我们形成开阔

的视野，并从这样的唯一性和褊狭性当中解放出来，修正、更新并重建我们的思想观念。由此，思想史家的任务就是以“知识考古学”的方式来挖掘它，让其呈现出这些瑰宝的内在价值。上述这一启示只是在历史时间的维度内进行的思考，从空间的维度来说，研究另外一种空间，思想观念的西方特性和经验将有助于我们从比较的意义上获得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比较性的价值取向。在我看来，未来的西方思想史研究，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将会在“空间转向”的维度下展开，并带有鲜明的比较史研究的取向，这也将是今后学术创新的新起点和建构未来理想社会的宝贵学术资源。

为此，端正思想史研究的态度，既无需追求读史使人明鉴的古训，也不必为历史研究的无用而自寻烦恼。历史研究，特别是思想史研究可以仅仅出于个体的兴趣，出于对未知世界的探讨，出于对历史上遗留的多样性瑰宝的好奇和追求。学术研究的动力原不过如此。同样，对于读者而言，对思想史研究成果的喜爱，不能仅仅出于某种既定观念的支配，而应切记，思想史研究只是丰富与扩展自己理解社会的视野，进而转化为参与社会实践、建构社会现实的一种力量，人们不必也不应当试图从思想史研究者的结论中找到一些直接有助于自己的答案。

今天，面对西方思想史研究热潮的来临，作为从事这一专业的研究者在深感庆幸的同时，也需要冷静地看到：社会民众对西方思想史研究的喜爱将是一种更大的推动力，以促使我们这些研究者提升自己研究的水平。平心而论，尽管我们在西方思想史研究中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无论是在理论方法，还是在研究内容上都还有很多工作甚至空白需要去做、去填补，例如就欧洲思想史研究而言，我们还肩负着理解其研究范式和研究典范，夯实欧洲思想史研究基础的重任。正基于此，我们才决定组织选编翻译这套欧洲思想史。

在我们选编的这套丛书中，有两本侧重于理论方法，有三本侧重于具体的个案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历史研究的“语言学转向”或“文化转向”的展开，思想史研究范式也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在研究对象上从原先重视经典思想家的著作转向研究普通民众的心智，因此文本的构成发生了转换，研究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宏大的主题，而是普通人的观念。从思想史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一转变为思想史的研究开拓了新的空间。所

以,法国历史学家夏蒂埃对传统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提出了质疑:到底是思想史还是文化史?本丛书中的《现代欧洲思想史——新评价和新视角》一书就系统介绍了思想史范式转型的内在原因,以及如何在多学科以及后现代思想的影响下发生了这一转变。

时至今日,经过众多研究者的努力,学界已对剑桥学派、概念史等思想史研究范式多有了解,但在全球化的今天,如何在新的时代境遇下不断推陈出新、拓展思想史研究的范式也值得我们思考。如果说过往的思想史研究多聚焦于单一主权国家或民族国家这一地理空间的话,那么如今,当思想史遇上了全球化,思想史家必须要思考思想史研究如何应对空间的变化,并探求空间要素、空间视域与思想史研究的关联性。也就是说,全球化的空间扩展是否促成了思想史研究的“空间转向”?同样,在概念史研究中,关于概念的空间流转和再概念化也涉及空间问题。举例来说,当我们将英国或者欧洲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人,或者工人阶级作为一种概念的时候,今天中国的经验告诉人们,以“农民工”的特质来对原有的“工人”或者“工人阶级”进行再定义和再概念化将是概念史研究中需要重视的内容。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将概念放在不同的新空间中,运用不同空间所形成的经验和资源来处理和理解概念范畴将会扩展出思想史研究的新边界。换句话说,也只有实现了“空间转向”,思想史研究才会得到极大的丰富和提升。在这一方面,国外同行已做出了领先一步的表率,例如对“帝国”的思想史讨论。

正是基于这一思考,我们可以在空间的维度上来理解和表达我们所选择的这套译丛的主题和主旨。例如,当我们把欧洲思想史或者西方思想史看作一个整体性的思想单元时,还需要记住它们内部之间的差异,从空间上讲,需要注意其内部各民族的特性。为此,本丛书特意选择了《民族语境下的政治思想史》,希望在“民族”的空间和特性下来理解欧洲思想史研究的各种学术谱系,这种学术史的梳理和反思将会成为研究范式不断推陈出新的基础和动力。

受剑桥学派注重于“语境中的观念”的影响,我们特地选择了关联到欧洲社会体制的两个重要观念——“市场”和“共和主义”——进行翻译介绍。在《历史语境中的市场——现代世界的思想与政治》一书中,学者们从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空间来考察“市场”这个概念。一旦引入这样的思

想史研究维度，我们就可以理解“市场”概念的历史性以及空间上的多样化的社会文化特性，而由此所形成的社会经济体制要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更需要提出的是，此书的意义就在于它有助于帮助中国在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重新理解“市场”的内涵。同样，在学术上，对“市场”概念的思想史研究也成为概念史和社会经济史相结合的典型个案。

自20世纪80年代起，国际学术界开始关注“共和主义”，直到今天这样的研究热潮仍方兴未艾。《共和主义、自由与商业社会：1649—1776》一书收录了当今世界范围内对共和主义思想研究最为著名的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且在时空上涉及诸多国家的诸多历史时期，如英国革命时期的共和主义、日内瓦的共和主义（日内瓦的共和主义颇为典型）、荷兰的共和主义（荷兰是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商业共和国）、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共和主义思想、美国建国时期的共和主义等。从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维度来考察“共和”概念的流转及再概念化过程将会深化人们对共和主义类型、内容和内在价值的理解。

受新文化史的影响，思想史家吸收了文化史研究的方法，不仅研究普通人的观念，还在更为宽广的范围内侧重于研究思想或观念如何成为政府以及其他公共部门的认同，成为社会运转的基础，而这些观念反过来又如何建构社会的实体性内容。这一研究方法更多地把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借用一句流行的术语，可称之为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史转向”。本着这样的主旨，本译丛选译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帕特里克·乔易斯的《自由的法则——自由主义与现代城市》。本书并不聚焦于纯粹的思想文本，而是从城市空间的安排入手，着重探讨19世纪英国的城市政府——例如伦敦、曼彻斯特——如何接受自由的法则并进行自由主义式的治理，从而塑造了自由的城市空间。譬如，他以一系列的个案，例如曼彻斯特和伦敦的图书馆来考察城市图书馆“公共性”的形成。总之，正是通过这些具体的施政实践，城市才被建构为自由的公共空间，并进而形成自由的城市。

作为主编，我希望这套译丛能够对推进中国的欧洲思想史研究尽绵薄之力，为此，我要感谢很多同仁的帮助。首先应该感谢的是在本译丛的编选和翻译中付出很多辛劳的译者。他们放下手中繁重的研究任务，转而从事这一没有名利，甚至按照现有量化指标都无法列入科研成果的工作。还要感谢一些虽没有署名但也给予许多帮助的人，如上海大学英语系研究生李薇薇，华

南师范大学历史系黎英亮博士、英语系冯茵博士、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王峰玲博士等。此外，还要对人民出版社的贺畅、卓然等编辑致以谢意，正是她们细致耐心的工作，才保证了本译丛的顺利出版。最后应该感谢复旦大学及其历史系，在得知本译丛即将翻译出版时，他们同意将其列入“985三期”科研项目予以支持。

在中国翻译出版欧洲思想史研究的著作，从而引入另一地域空间的思想表达自有其不同凡响的意义。欧洲同仁所贡献出的思想史研究成果势必会为我们的比较、反思并反观自身提供另一种视角，而来自于不同地理空间的经验和记忆将有助于人们形成开放的、多样化的思维模式，进而帮助我们自身社会空间的建构。在各种社会性要素全球性流动的今天，思想观念的变革、话语体系的转换对于理解和助推这个飞速变化着的世界必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思想史研究的魅力和意义或许正在于此。

李宏图

2014年1月3日

目 录

第一章 历史语境中的市场:思想、实践与管理	(1)
马克·贝维尔 弗兰克·特伦特曼	
第二章 正确评价农民和农业协会在欧洲农村“大变革”中所起的 积极作用	(24)
詹姆斯·利夫西	
第三章 法国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从卢梭到贡斯当	(43)
理查德·沃特莫尔	
第四章 托利党与市场:1800—1850 年的英国	(65)
大卫·伊斯特伍德	
第五章 19 世纪法国和德国的行会理论及行会组织	(85)
海因茨-格哈德·豪普特	
第六章 19 世纪的风格,绿色意识: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和 约翰·罗斯金	(99)
唐纳德·温奇	
第七章 滕尼斯论“社群”和“公民社会”:澄清后马克思政治思想中的 几个不同观点	(122)
约瑟·哈里斯	

第八章 德国历史主义、美国进步主义社会思想及 19 世纪 80 年代以来 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136)
阿克塞尔·R. 夏弗	
第九章 市场的文明开化:20 世纪英国、日本和美国的消费者政治活动 传统	(160)
帕特里夏·麦克拉伦 弗兰克·特伦特曼	
第十章 市场经济理念在印度的政治合法化及印度经济改革	(190)
罗伯·詹金斯	
第十一章 电子市场对地域和制度的依赖:以全球资本市场为例	(212)
萨斯基娅·萨森	
撰稿人简介	(233)
索引	(236)
译后记	(260)

第一章 历史语境中的市场：思想、实践与管理

马克·贝维尔

弗兰克·特伦特曼

社会生活需要个体行动之间的协调。协调可以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出现，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20 世纪的许多时候，全世界以两种协调形式稳定商品价格——市场和国家计划。市场和国家往往以对立的两极出现。拥护市场者认为市场有一个自然和自发形式的秩序，在这个秩序中，个体的自由行动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与公共利益协调起来。与此同时，拥护国家者认为统治集团的计划有一个理性和正义的秩序，在这个秩序中，人类约束自己的行为以便战胜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的非理性和剥削。相比之下，今天我们看到，双方的观点及其显示的二分法遭到的怀疑日益增多。当然，如今仍然存在一个突出的甚至可能是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新自由主义思想。它持一个理想化的市场观，认为只需让个体之间进行自由交换，市场就会形成一个为公共利益运转的自发协调机制。但是，还有一个正在成长的“新政治经济学”，指出了这种对市场的理想化解释存在的肤浅和盲点。这个“新政治经济学”鼓励交易的、制度的和进化的经济学，以此来证明，要建立和变革包括市场在内的所有经济制度都必须以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威为背景。^① 所有经济活动都不得受制于形式复杂的规则，这些规则连接和控制着经济活动者、组织及其互动。

《历史语境中的市场》是一本多学科交叉的论文集，设法解答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市场的影响及相伴随的问题。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各种规章和

^① 我们要向撰稿人致谢，是他们提供了有益的评论和建议。欲了解这几个在研究范围上相互重叠的经济学分支的重要理论，参阅 O. Williamson, "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 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2 (1979), pp. 223—261; A. Shonfeld, *Modern Capitalism: The Changing Balance of Public and Private Power* (Oxford, 1965), 以及 R. Nelson and S. Winter,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 (Cambridge, MA, 1982)。不久前对市场体制的合理性给予哲学批判的是 J. O'Neill, *The Market: Ethics, Knowledge, and Politics* (London, 1998)。

协调是如何被设想和建立起来的？政治秩序、社会凝聚力和道德规范的思想是如何影响思想家和社会运动对市场的理解的？外生于市场的甚或批判市场的思想和实践是以什么方式影响现代资本主义演进的？这本论文集转换视角，不考虑制度前提或制度信任的问题，而是考虑思想、语言及孕育其中的非主流观点，以此来推进有关市场所受影响的争论。

首先，本书是一项追溯性研究计划。国家与市场或者文化与市场之间的二分，在 20 世纪大行其道，其后果是遮蔽了关于市场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丰富的思想史。该书不想探讨支持市场经济和反对市场经济两股力量间的对立，这种思维方式过于简单化和理想化，而是探讨自由主义者以及激进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对市场的矛盾性看法——这些根植于思想传统和社会实践的矛盾性看法——是如何形成的。为发掘这段丰富且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史，该书提供像密尔(J. S. Mill)、萨伊(J. B. Say)和滕尼斯(F. Tönnies)这样的经典思想家的原稿，让我们在阅读经典的同时，扩大视野，去关注在讨论市场的文献中易受忽视的群体，例如保守的社会精英或者有组织的消费者的思想。^①无疑，我们不能简单地照搬历史来解决当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然而，历史可以为我们展示早先的思想和实践，以提醒我们注意驾驭市场的方式，帮助我们反思当代人管理市场的智慧，探索新的市场管理模式。对那些有志于改良市场或使市场更加文明的人，新政治经济学已经开辟了新的道路。例如第三条道路，它力图避免国家与市场的二元性。正如本书所表明的，早先的经济思想和实践中也存在着不同于这种二元对立思维的例子。历史给我们提供了将公民社会、市场和国家联系起来的很多途径。对这些途径的了解，可以为现在的改革者提供机会，但也会使他们陷入两难窘境。

追溯受思想传统和社会实践影响的市场，为本书的第二个贡献——重思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谁扮演主动角色——打开了空间。如果说市场与国家或市场与文化之间的二分，是主要的分析框架，那么另一个二分，即现代与传统之间的二分，则是对这一分析框架的补充。程式化地理解自由市场——即将自由市场视为现代社会特有的冷冰冰的协调模式，促使人们同样程式化地描述

^① 欲了解对现代社会思想经典著作的批判性概述，见 R. J. Holton, *Economy and Society* (London, 1992)，以及 D. Slater 和 F. Tonkiss, *Market Society: Markets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2001)。

据说是传统社会特有的友善的社群关系。这样一幅图景,就像人类学家们观察的那样,既掩盖了现代市场的文化动态,又掩盖了“传统”社群的市场因素。^① 它还在现代资本主义演进中给不同的社会群体分配一个主动或被动的先验位置。农民和乡绅常被刻画成抵制现代精神的堡垒,企业家被描述为现代精神的引擎,自由政治经济学家则被视为现代精神的先知。甚至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他以创造性的广度和深度来探究现代资本主义的演进——也不能免俗,他对各种群体起的作用作出了过于简单的解释。尽管桑巴特非常强调经济生活是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尽管他认识到前现代欧洲的精英进行奢侈消费的重要意义,但由于他把现代资本主义定义为由理性和计算精神驱动并由分等级的组织和决策推动的一个体系,因此他得出这样一个论断: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源于正好体现这种精神的那群人,即企业家。桑巴特指出,“假如现代经济理性主义像一架钟表的结构”,那么,“必须有人去给它上紧发条”。^② 企业家传播经济理性原则,这些原则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或“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时代(1760—1914)渗入社会。“〔既然〕劳动和资本都依靠资本家企业主,并通过后者的创造性活动被唤起活力……”那么,现代资本主义的“驱动力”是资本家企业主,而且仅仅是他,因为他是“唯一的‘生产力’,即创造力”。^③ 于是,在桑巴特对资本主义演进的描述中,其他社会群体扮演着消极的人类资源的角色,他们被重新安排和组织起来以符合企业理性主义的需要。

尽管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的著作从迥异的理论视角来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尽管他也批判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方面的观点以及自由主义者宣称的市场兴起是不可避免的观点,但是他阐明了作用—反作用模式在社会科学中普遍存在。根据波拉尼的观点,现代社会的动力源于一个“双重运动”:不断扩张的市场运动遭遇社会贸易保护的反向运动。社会运动和社会团结的观点的出现

① A. Appadurai, "Introduction: Commodities and the Politics of Value", 载于 A. Appadurai 编,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1986), pp. 3—63.

② W. Sombart, "Capitalism",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III, E. R. A. Seligman 和 A. Johnson 编, (New York, 1930), p. 205.

③ W. Sombart, *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Historisch-Systematische Darstellung des gesamteuropäischen Wirtschaftslebens von sein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vol. III: *Das Wirtschaftsleben im Zeitalter des Hochkapitalismus* (Munich, 1927), pt 1, p. 12; 当然,动力(agency)没有被均等地分给企业家。随着时间的推移,仅有为数极少且在不断减少的一群商人拥有充当“资本主义之父”这一角色的创造性天才。

是为了控制和改良市场社会,但是在市场社会起源时它们并不存在,造就它们的是重商主义政策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这里,我们再次发现“经济自由主义原理”与“社会保护原理”在概念上的割离,前者旨在建立一个自我规范的市场,依靠商业阶级的支持;后者意在保护人与自然,^①主要依靠劳动阶级和地产所有者的拥护。这两个概念的割离使他坚信作用—反作用式的因果解释,根据这一解释,市场及其倡导者首先出现,而对社会保护的关注及其支持者只是随后而至。尽管波拉尼的观点大体上是总体性的,并突出社会—经济体制及其影响的主导性,但是他对市场社会的强烈厌恶导致他将市场社会的发展刻画成一个消极的背离,一个传统价值的影响日渐衰微的过程,结果,社会保护思潮应运而生。

这种认为各社会阶层在社会协调上持截然不同观点的认识并不正确。自由主义者并不必然是“现代”社会的先知——在这一社会里客观的市场扮演着社会协调的主要形式——相反,他们也关心对人与自然的保护。同样,农民和乡绅并不必定是传统的堡垒。我们可以发现,在现代性这个问题上,不论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的精英和社会底层的群体,他们的态度都复杂矛盾,并非简单绝对。这个问题对于所有这些群体而言,不仅仅是简单地支持或者反对市场,而是社会和政治该如何介入市场。对市场持矛盾心态的社会群体和知识传统也影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架构和演绎变迁。一旦我们突破将市场视为资本主义理性的内在发展源泉这一观点的限制,我们就会很快发现现代理性的其他源泉,例如科学或交流,能被包括农民在内的无数社会群体利用。同样,正如本论文集的其他几篇文章在研究消费政治学、探索印度各界对本国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的市场化的反应,以及分析社会的交融程度对今天全球资本市场中心的形成所起的重要基础性作用等时候所做的一样,在将注意力从早期现代资本主义转向 20 世纪末时,我们也要追问:传承下来的社会基础结构和文化信仰是怎样继续促进而不是抵制全球资本主义的?

同时本论文集的文章试图将市场作为社会协调模式的思想 and 实践重新置

^① K. Polany,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1957), p. 130. 还可参见 Ir. Block 和 M. R. Somers, “Beyond the Economistic Fallacy: The Holistic Social Science of Karl Polanyi”, 载于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T. Skocpol 编 (Cambridge, MA, 1984), pp. 47—84。

于它们当时所处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中去考察。这本论文集有助于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就如何将过去和现在的市场重新置于它所处的时代背景进行考察并展开对话。尽管一些单个篇章显示出特定学科研究方法所独有的优势,但是它们都有相同的研究思路,即结合具体历史背景来研究市场。因此,它们把我们的视线从市场在本质上是善还是恶的问题,转向经济管理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想通过史料和理论的基础研究,探索一条转向经济管理的捷径。我们认为,经济管理已经成为一门跨学科的人文学科,受到从文化史家、建构制度主义者(constructivist institutionalists)到后结构主义者(post-structuralists)和民主多元论者等各学科学者的关注。^①各学科对经济管理的研究方法种类繁多,但大多数研究方法都有以下几个相同的理论性和本质性的立场:关心意义和信念并认为它们是社会和经济实践的构成要素,对历史场所的多元化感兴趣,强调事物产生的历史偶然性和语境,认识到批判在经济管理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本书各章从历史的角度对这些主题给予了富有见识的研究。本书在总体上可能会给人这种感觉:经济管理发展的动力源自某个社会群体。我们想指出,经济管理发展的动力源自多个社会群体。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更进一步加强对经济管理的研究。经济管理的概念提高了非主流的理论、研究模式以及政治实践的地位,它们被视为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公共选择理论的拓展应用方面的典型特征。^②

转向管理

出于几种相同的原因,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理论家们已经将研究兴趣转

① 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不仅适用于国家还适用于个体公司。关于公司管理——与法律和政治当局相关的公司——的研究,见 J. McCahery, P. Moerland, T. Raaijmakers 和 L. Renneboog, *Corporate Governance Regimes: Convergence and Diversity* (Oxford, 2002); 以及 M. Roe, *Political Determinant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Oxford, 2002)。关于公司管理与经济管理之间的纽带,见 Hall 和 D. Soskice 编,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Oxford, 2001)。

② 当然,公共选择理论的种类比我们这里能考虑到的要多。人们经常在未考虑具体的社会规约和信念的前提下,就对动机、利益和理性作出普遍假设。一些公共选择理论家对这种做法持异议,他们希望拓展研究范围,以考察这类假设的偶然性与语境性。见 F. Krashchwil, *Rules, Norms, and Decisions* (Cambridge, 1989); W. Mitchell, "The Shape of Public Choice to Come: Some Predictions and Advice", *Public Choice* 77 (1993), pp. 133—144; C. Vicchaeri, *Rationality and Co-ordination* (Cambridge, 1993), 尤其是 pp. 221—241。关于公共选择理论的局限性和对它的完善,见 D. Green 和 I. Shapiro, *Pathologie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New Haven, 1994)。

向管理。政治学家用这个概念描述国家内部的变化。^① 他们认为,全球化、信息技术已经开启了新的时代。社会经济的进程已经加快了变化的步伐,使那些曾经在组织之内和之间建立起边界的東西变得流动易变并增强了互利互惠的彼此依赖。结果出现了一个转换,即政府从统治转换到管理,或者变成一个职权被掏空的政府。据此观点,一个新的半自治的政府形式已经出现,它的职权已经从内、外部遭到侵蚀,它只能在彼此依存的网络里与其他的组织协力行动。因此,研究者将注意力从民族国家的正规制度转向管理或引导过程,^② 这些过程经常发生在国家和公民社会间的过渡地带,这种过渡地带可能是地方性的也可能是跨国性的。随之出现的管理方面的文献已经利用了社会学资料,后者认为,社会网络会取代统治集团和市场,成为新型协调形式。^③ 据此观点,当代政府管理的一个特征是政府在网络中并通过网络进行运作。这种将管理视为公民社会内部的网络的看法,挑战了政府与市场之间过于严格的二元对立。政府和市场都不是以一个独立自治的制度而存在,相反,它们与公民社会内部更广泛的管控模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二者在历史中都是集体选择造成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后果。

制度主义和去中心化理论已经为政治学家提供了探讨管理形式的方法,这些管理形式被视为集体选择的历史产物。一方面,制度主义强调集体选择及其影响有地域性,并随时代的变化而不同;它引发人们研究统治集团、社会网络以

① 关于政治学向管理的转向,见 R. Mayntz, "New Challenges to Governance Theory", 载于 H. Bang 编, *Governance, Governmentality, and Democracy* (Manchester, forthcoming, 2004)。更多的例子,见 J. Kooiman 编, *Modern Governance* (London, 1993); J. Pierre 编, *Debating Governance* (Oxford, 2000); R. Rhodes, *Understanding Governance: Policy Networks, Governance, Reflexivity and Accountability* (Buckingham, 1997); J. N. Rosenau 和 E. O. Czempiel 编,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1992); 以及 L. Roubon 编, *Citizens and the New Governance Beyond Public Management* (Amsterdam, 1999)。

② 我们可能质疑这一转向引导和协调的思想的新意。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许多国际主义者都对协调模式很感兴趣,他们的兴趣源于对自由主义的国家主权观的批判:见 A. Salter, *Allied Shipping Control: An Experiment in International Administration* (Oxford, 1921); A. E. Zimmern, *The Prospects of Democrac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1929); 以及 F. Trentmann 的论述,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Economy: The Erosion of Free Trade in Britain, c. 1897—1932" (Harvard PhD thesis, 1999), chs 5, 6。

③ 参见 J. Frances, R. Levacic, J. Mitchell 和 G. Thompson 编, *Markets, Hierarchies, and Networks: The Co-ordination of Social Life* (London, 1991); 以及 W. Powell, "Neither Market nor Hierarchy: Network Forms of Organization",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ur* 12 (1990), pp. 295—336, M. Castells,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vol. 1: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Oxford, 1996); 还可参见新期刊 *Global Networks*。